

地域空间与作品汇编：中国古代 地域总集之生成与演进

谷玲玲

【摘要】地域总集以复杂多样的类型集中展现中国古代地域文学的面貌。但学界并未给予其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自唐至清,地方官或知名文人领衔主持地域总集的编纂与刊刻。地域总集发轫于唐代,在宋代借助于普及化编纂的地方志与强化的地域空间意识,转获突破性进展,又在经历元代的相对沉寂后,于明代首次达到全国范围内、多层级的编纂高潮,至清代更展现鼎盛风貌。且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地方志和地域总集一直保持共进互勘的耦合关系。而由纵向时间维度、横向空间维度和内部的类型嬗递三个维度视之,则可知地域总集的编纂呈现出精微与突进的演进态势。

【关键词】地域总集;编纂主体;类型构成;地方志;演变轨迹

【作者简介】谷玲玲,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京),2021.6.68~77

地域总集是指明确聚焦于某行政区或特定地理空间范围而采收作品的文学总集。它们往往能集中展现地方文学的发展,将当地文人的文学作品或涉及某一地的诗文悉尽收录,既使大量名不甚显的地方文人的作品得以留存,又与别集、地方志等相辅相成,可补别集、方志等辑录诗文史料之不足。梁启超曾说:“历代集部所著录,若《苏州名贤咏》《浙东酬唱集》《河汾遗老诗》《会稽掇英集》《宛陵群英集》……若胡之《甬上耆旧诗》三十卷,李补之为若干卷,全之续为七十卷,又国朝部分四十卷;沈之《携李诗系》四十二卷;若张之《姚江诗存》若干卷;若汪之《粤西诗载》二十五卷、《粤西文载》七十五卷……悉数之殆不下数十种,每种为卷殆百数十。其宗旨皆在钩沉搜逸,以备为贵;而于编中作者大率各系从小传,盖征文而征献之意亦寓焉……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诗文之征,耆

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①梁先生列举了多种地域总集,指出其往往因编纂者恭敬桑梓、鼓舞后学的心理而出现,是形成地方学风的一个坚实基础,充分肯定了地域总集所蕴含的重要意义。

蒋寅也曾论及地域总集的独特价值:“与地方志编纂相伴的地方性文学总集、选集和诗话不断涌现,使文学的地域传统日益浮现出来……以地域文学为对象的文学选本,也许是明清总集类数量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种群。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数量庞大的郡邑诗选和诗话,显示出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和单位来搜集、遴选、编集、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②蒋寅所言“地方性文学总集”即为地域总集。关于“地域总集”的概念问题,夏勇《目录学视域下的地域总集范畴辨析》^③一文已作辨析,兹不赘述。

地域总集从孕育到成型,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从西周时期《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到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楚辞》,再到汉代的《邯鄲河间歌诗》《洛阳歌诗》等以“地域+诗体”为组合方式的乐府诗数篇,而后才演化成唐代《丹阳集》这样成型的地域总集。可以说,殷璠所辑《丹阳集》是地域总集编纂正

式发轫的重要标志。

地域总集源起于唐代,发展于宋元,至明清臻于鼎盛,民国亦盛行不衰,是研究地方文学的一大宝库。但学界对地域总集的关注甚少。截至目前,已获学界关注的仅有数十种,只是地域总集总量的冰山一角。梁启超言其“殆不下数十种”,实际数目远不止于此。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唐五代编纂的地域总集至少有5种,宋代约有57种,元代约有13种,明代约有230余种,清代有1100多种。本文将从宏观视角集中探讨地域总集的编纂主体与类型构成问题,厘清其与地方志的复杂耦合关系,并多视角、深度追踪其演变轨迹。

一、权威与辑选:地方精英群体的地域总集编纂行为

地域总集的编刻需要具备别集数量丰富和刊版技术相对成熟两大基本条件。《郡斋读书志》曰:“学者欲矜式焉,故别而序之,命之为集。盖其原起于东京,而极于有唐,至七百余家。”^④自汉至唐,别集的编纂渐成繁荣局面,客观上为总集的编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叙》云: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版印行(事见贯休《禅月集序》)。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于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篋中集》则附登乃弟。^⑤

可知,总集的发展又受到别集传播方式的深刻影响。六朝以后文人不但编次文集,至唐末更可刊印文集。印刷技术的发展,提升了文献传播的效率。而别集存在杂乱无序、易于散佚、编纂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造纸和刊印技术又相对成熟,大大刺激了总集编纂者的责任感。他们便“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同时“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⑥,编刻总集,流芳百世。

现存较早的地域总集是盛唐诗选家殷璠所辑《丹阳集》,约成于开元末,选录润州五县18人之诗,

现仅有陈尚君所辑残本。唐代另有地域总集,如殷璠所辑《荆扬挺秀集》,采录荆、扬二州诗人秀句;宜春刘松所辑《宜阳集》,集其州天宝后诗470首;莆田黄滔辑唐高祖武德至昭宗天佑年间闽人诗句为《泉山秀句集》;嘉州刘赞辑蜀中唐人文集为《蜀国文英集》等。今所见编于唐五代者5种,原书皆佚。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除刘松(唐末进士)外的编者皆有担任地方官的职历记载。

降至宋代,地域总集的编纂始成规模,数量明显多于唐五代时期,但也主要由统领一方的官员主持采编。

若说宋代统治者的重文政策及较为成熟的造纸和印刷技术是编印大型文献的时代内因,那么宋代地方文官制度及其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与传承文献的使命感,则为地域总集大规模出现的直接影响因素。宋代推行文官制度,地方政权多由文官执掌。导正地方文教学风、保护地方文化也可作为考课政绩。多方面因素导致地方官员十分关注文献的散佚情况。赴越州任官的孔延之感慨“予尝恨诗书之阙亡,使善恶之戒不详见于后代,盖编脱简落不能补之故也”^⑦,于是一上任便主持编纂《会稽掇英总集》。任台州知州的李兼也曾言:“天台以山名州,自孙兴公赋行江左,追今千祀。大篇春容,短章寂寥,未闻省录之者。予来经年,思会粹为一编书,顾无其暇。方延诸儒议修图谍,谓兹尤所先急。”^⑧对于行将消失的地方文献,地方官普遍有焦虑和紧迫感,纷纷组织编刻地域总集。范成大、蒲宗孟等在做地方官时,都曾积极组织地方文献编纂活动。范成大编纂《吴郡志》,大量收录有关苏州的诗文。蒲宗孟任杭州知州时广集钱塘诗,自南朝宋齐至宋元丰年获3000余首,辑为30卷,刊印面世。

唐宋时期编纂地域总集的风气,到明清时期更加盛行。而纵观唐至清,可发现地域总集的编刻权,主要掌握在地方官与知名文人的手中。若细分之,则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地方官领衔,具体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本籍地方官与当地文人合力而编。兹以《成都文类》

为例。《成都文类》是南宋袁说友担任四川安抚制度使时,与扈仲荣、杨汝明、费士威等八位地方文人共同编撰的。四库馆臣赞袁说友“学问渊博,留心典籍”^⑨。袁说友所选为其门下幕僚,均驰名蜀中且深受蜀地文化的熏染,故其所编《成都文类》可综合反映蜀地文学的多元特征。二是外籍地方官带领地方文人而编。宋前少有系统整理地域文集的现象,诸多文献或失传,或散落各处,搜集起来殊为不易。对于外籍地方官来说,相对陌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更是雪上加霜。宋代教育与科举兴盛,使地方知识阶层队伍也日渐壮大。而地方文人留心于本地诗文的整理,可能在地方官组织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收集工作。兹以《天台集》为例。其成书得益于地方文人的贡献,既有“州士李荣昆仲出其先公御史所哀文集四帙以为赠”,又有“州学谕林师葳又示唐宋诗三百余篇”。故李兼序中叹曰:“不出户庭而尽睹海山之胜,不费探讨而坐获巾笥之藏,天下之事成于有志,其理固然,未有若是之捷且速也!”^⑩可见,地方文人的贡献,更加提升了地域总集的编纂效率。又如《严陵集》的编者董弅,本为山东东平人,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担任严州知府时编刊此集。他谈及收录过程:“尝与僚属修严州图经,搜求碑版,稽考载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彦先家所藏书,与教授沈懔广求备录而编成。所收严州诗文集自六朝谢灵运、沈约以下迄于南宋之初。”^⑪可知其与僚属、郡人等携手编纂《严陵集》。而除“搜访境内断残碑版及脱遗简编”所获“逸文甚多”外,又有“郡人喻君彦先悉家所藏书讨阅相示”。编纂过程虽艰难,但所幸众志成城。又如,主持纂辑会稽文献的孔延之,并非越州本地人,且在越为官仅一年之余。但他一上任便遣人四处搜岩剔藪,且广开寻文之路,因此收获了地方文士珍藏的诸多秘文,编成《会稽掇英总集》。三是外籍地方官独编。如曾旼,字彦和,晋江人。他在宋元丰年间(1078-1085)担任润州知府时,曾采选自东汉至南唐诸家诗文集,获歌诗赋赞共500余篇,辑成《丹阳类集》。但从总体来看,外籍地方官独编的情况是较少的。

第二类是知名文人领衔,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本地文人独纂。宋倪祖义为湖州归安人,少聪俊,仕未达,一生穷困潦倒,但编成了《吴兴分类诗集》。又如汤宾尹,字嘉宾,号睡庵、霍林,宣城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任翰林院编修,万历三十八年(1610)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受“庚戌科场案”牵连,未续出仕。汤氏从事编书、校书与评书,坚持了三十余年。在天启六年(1626),他已57岁时,刊刻了《宣城右集》,采录自三国至明代关于宣城的文章315篇,诗歌709首。此书乃为其在风烛残年之际献于乡邦的心血之作。二是在外地做官的本籍文人编纂。例如周复俊,本为苏州府昆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工部主事,历任四川、云南左右布政使,官至南京太仆寺卿,采录自西晋至明代昆山文人诗作,兼收昆山以外文人题咏昆山诸诗,辑成《玉峰诗纂》。三是由地方文人主持,外籍地方官参与合编。兹以《滇南诗略》的编纂过程为例。清乾隆时期,袁文典和袁文揆组织云南地区多位诗人,完成这“一方文献所系,数百年未举之事”。而除当地文人外,此书的完成更受益于宦滇官员(例如陈孝升等)的支持。陈孝升,字云岩,浙江海宁人,历任云南永昌知府、云南粮储道、云南布政使,其时袁文揆为其幕宾,与其相依十余年。陈孝升的支持,为袁文揆编纂总集提供了多方有利条件,既使他可以召集诸多地方文人,组成数百人的编审队伍,又使其拥有足够的财力完成《滇南诗略》与《滇南文略》的编纂与刊刻。《滇南诗略》有序跋、弁言多至13则。撰序者既有宦滇督抚,也有文坛名宿;参订或同辑者更是多达200余人,而其中宦滇官员占到四分之一左右。四是外籍文人主持编纂。例如清乾隆年间,浙江著名学者卢文弨,在担任常州龙城书院山长期间,领衔编纂了《常郡八邑艺文志》。

就中国古代地域总集的编纂总体状况而言,唐宋元时期地域总集的编纂活动主要由地方官组织,降至明清时期,文人领衔编刻地域总集的现象才趋于兴盛,有如明代董斯张编刻《吴兴艺文补》、清初黄宗羲编纂《姚江逸诗》等。以上所讨论的主要是以单

一地缘属性为断的地域文学作品总集。而若将讨论范围扩展到包含其他属性,例如夹杂题咏属性的地域景观题咏总集(如宋龚昱辑《昆山杂咏》等),杂有唱和属性的地域唱和总集(如《荆溪唱和诗》等),间有氏族属性的地域文人家集(如《江都许氏家集》等),以及特殊的地域名人选本(如《广州四先生诗》等等),这些种类地域总集的编纂,则多由知名文人完成。需要说明的是,某一地区的课艺总集,如《山左诗课》等亦可归之于地域总集的研究范畴。这类总集往往由负责该地区考课的地方官员主持编纂。

地方官或知名文人编纂地域总集的动机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集存地域文献。例如宋《会稽掇英总集》编者孔延之云:“尝恨诗书之阙亡,使善恶之戒不详见于后代者,盖编脱简落不能即补之故也……题之板,不如刊之石;刊之石,不如墨诸纸……故自到官,申命吏卒,遍走岩穴,且据之编籍,询之好事。”^⑩又如,明陈禹谟为张应遴所辑《海虞文苑》作序云:“第历岁绵邈,散失为多,浸久浸湮,良足惋惜,文学张选卿氏特汇而辑之。”^⑪二是弘扬乡邦文粹。明陈仁锡辑刻《明文奇赏》四十卷,搜罗丰富,但因道远而只录了晋地文人七篇文章。明范弘嗣气愤地说道:“吾晋岂明无马迁、柳州其人乎?”遂编《晋国垂棘》,广收当地诗文,“俾宇内不敢轻吾晋”^⑫。又,清初黄宗羲遗憾地说道:“有唐一代见之《唐诗纪事》者,虽下邑偏方皆有诗人点缀,而姚江独缺;宋之诗人高菊涧(高翥)、孙常州(孙嘉)皆为眉目,其集皆不传;元之郑山辉(郑彝)、杨元度,其时诸老集中多见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数百年以来,海内文集列屋兼辆,而姚江独少。”^⑬于是他便着手编成了《姚江逸诗》。三是阐发忠烈,表彰贞逸。清全祖望所辑《续甬上耆旧诗》,选录了700余人的古今体诗15900多首,短文近100篇,并附有小传事迹等珍贵文献,补史之不足,共有125万余字。清初浙东宁波地区抗清斗争尤为惨烈,而此书收录数量最多的正是当地抗清史诗,以诗存史,可谓寄托深远。四是结交权贵。清胡文学在《甬上耆旧诗》序言中描述这种现象:“余初见一时词家,方录其乡先辈诗,率先撰一征启,布诸

郡中,凡名荐绅先生与山人词客,宿有诗名及他右族子孙,俱取其先人行世名集以副所请,填塞几席。选家坐取诸集,录其擅名诗及后人方贵盛者,并为冠冕。至于单门逸响非世所称,子孙出其遗草与录附一二,辄有德色,但略去取间,遂衰然大集矣。”^⑭胡氏言语之间,对此现象的鄙夷之意尽显无余。五是补备别集、方志等。清王应奎在所辑《海虞诗苑》凡例中云:“邑中诗人,既有专集行世者,佳篇虽多,采掇从略。所重搜残编于放逸之余,俾布衣穷老之士,一生吟咏,苦心不至终归泯没耳。”“是集所载之人,有为邑志所遗者,余特核其行事,表而出之。用以补一邑之文献,俾他年修志者有考焉。”^⑮地域总集不仅可以对别集有所补充,而且有助于已佚别集的重新辑得。兹以宋代著名儒者唐仲友为例。唐仲友,字与政,号悦斋,浙江金华人,著有《六经解》《帝王经世图谱》《悦斋文集》等著作八百余卷,所提出的经制之学,可与吕祖谦兄弟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鼎足而立。但因政见不合等原因,唐氏多次被朱熹严辞弹劾。其文集一度被忽视屏斥,致使散佚漫漶。《悦斋文集》亡于元明之际,重刊本后又失传。戚雄、阮元声、全祖望、王崇炳等明清文人均认为因与朱子学说不同而使唐氏遭受排挤,并因人废言,对其著作进行拉杂摧烧之类的渐灭行为是不公道的。经过戚雄《婺贤文轨》、阮元声《金华文征》、王崇炳《金华文略》等地域总集收录唐氏作品的努力之后,唐氏的文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全祖望费力采编的《唐说斋文钞》散佚后,清代浙江人张作楠等又在以上地域总集的基础上,集成《悦斋文钞》。

地域总集的编纂主体是由地方官和知名文人组成的地方精英群体。他们是地方文化的权威掌控者,也是地域总集的主要辑选和刊刻的操纵者。四库馆臣曾以明代董斯张等所编《吴兴艺文补》为例指出地域总集等志乘文献的一个通病,即“所采录前代颇详,而明代则渐滥”^⑯。可知编者在辑选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掺杂有主观意念。

二、繁杂而有序:多维审视地域总集的类型构成

地域总集以全面留存地方文学文献与展现地方

文学底蕴为宗旨,迥异于一般总集,且又具有其自身繁杂的类型构成特征。若细辨之,则可从以下五种维度加以审视。

其一是由编选宗旨视之,可分为史志类和文集类。史志类是指编者采录与某地域相关的文学作品,而与史部地理类典籍(如地方志)关联,旨在展现地理空间、历史人物、风土文貌等,以藻饰当地文化。例如明杨慎等所辑《蜀艺文志》,于诗大类下又细分有风谣、楚辞、都邑、城郭、楼阁、宫苑、江山、学校、陵庙、亭馆、寺观、怀古、纪行、时序、题咏、赠送、杂赋、道释、哀挽等小类,此做法与一般诗歌总集分类不同,但接近于地方志的分类方法。而文集类是指编者旨在展现当地作家的阵容与作品的序列,表彰先贤成就,梳理当地文学发展史。例如元汪泽民等所编《宛陵群英集》,辑宋至元宛陵(今安徽宣城)诗1393首,溯师友之渊源,录先贤之遗文,展现群英之荟萃。又如清初沈季友所辑《携李诗系》,收录自汉至清初嘉兴一郡缙绅、寒士、闺秀、方外、土著、流寓等吟咏传世之作,各有小传,仙鬼题咏、谣谚亦附于后,甄综颇为详备,加之清胡昌基所辑《续携李诗系》,可征汉至清嘉庆年间嘉兴一地诗歌发展历程。清初学者胡文学和李邕嗣所编《甬上耆旧诗》收录自春秋至明代万历年间两千多年宁波诗人之诗与传,又有清全祖望所辑《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明末清初宁波700余人的诗16000多首,文章100多篇,亦足可征宁波地区春秋至清初诗歌发展史。

其二是由采选内容视之,可分为地域范围总集、地域名人选本、地域唱和总集、地域景观题咏总集、地域课艺总集、地域家集等。一是单纯以地缘属性为断的地域范围总集,按层级来看,省府一级的地域总集,有如明陈是集辑《溟南诗选》,专收明正统至万历年间海南诗人(含神仙、闺秀)之诗500余首;清夏吟等辑《上江诗选二集》,收安徽地区490余人的作品。明谢肇淛辑《滇文》、清曾燠辑《江西诗征》、清梁善长辑《广东诗粹》等,分别收录云南、江西、广东等省府文人作品。州郡一级的,有如明董斯张等辑《吴兴艺文补》,采选汉至明关于湖州地区的诗文;明李

时渐所编《三台文献录》,收录台州一郡往哲遗文。县邑一级的,有如明王材编《黎川文绪》收录宋明时期黎滩县文人诗文。又如清舒顺方等辑《剡川诗钞》,由当时浙江奉化知县彭祖训选定采收奉化一地北宋至清初116位文人之诗凡926首。镇乡一级的,有如明末清初周天锡编选《慎江诗类》和《慎江文征》,收录浙江温州七里港镇一地文人的诗文作品。又如清初李光基辑《梅里诗钞》收梅里100多人的2000余首诗。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地域总集的地理范围不属于某一行政区划,如明张邦翼编《岭南文献》、清廖元度编《楚风补》和《楚诗纪》等,乃至为依据某山水区域,如明俞允文辑录自唐以来有关昆山题咏的《昆山杂咏》,明徐楚等编采新安江前人题咏诗的《青溪诗集》等。二是地域名人选本,如明曹学俭辑《广州四先生诗》、明袁表等辑《闽中十子诗》、清宋荦辑《江左十五子诗选》、清王揆辑《畿辅七名家诗钞》、清吴伟业辑《太仓十子诗选》、清庄令舆等辑《毗陵六逸诗钞》、清沈德潜等辑《嘉禾八子诗选》等。三是地域景观题咏总集,如明周复俊辑《玉峰诗纂》、明赵廷瑞等辑《南滁会景编》、明陈陞辑《历下十六景》、清佚名辑《人海诗区》等。四是地域唱和总集,如明俞允文辑《荆溪唱和诗》、清徐倬辑《双溪唱和诗》等。五是地域家集,如明薛冈辑《甬东薛氏世风删》、清许迎年辑《江都许氏家集》、清金望辑《嘉定金氏五世家集》、清陈恭尹辑《番禺黎氏存诗汇选》等。六是地域课艺总集,如明钱春辑《湖湘校士录》、清阮元辑《山左诗课》与《浙江诗课》等。

其三是由文体视角视之,有地域诗集,如明陈有守等编《徽郡诗》、明汪先岸编《休阳诗隽》、明杨德周等编《甬东诗括》、明阮元声等辑《金华诗粹》、清史梦兰辑《永平诗存》、清王豫辑《江苏诗征》等;地域文集,如明张应遴辑《海虞文苑》、明金德铉辑《新安文粹》、明赵鹤辑《金华文统》、明杨德周等辑《金华文征》、清田茂遇辑《燕台文选》、清邵松年辑《海虞文征》、清夏荃等辑《海陵文征》等;地域词集,如清戈元颖等辑《柳洲词选》等。又有地域尺牘集,如清黄定兰等辑《甬上明人尺牘》等。但更多的地域总集属于

多种文体综合类,如宋袁说友等所编《成都文类》,以文体相从,故曰“文类”,包括赋1卷,诗14卷,文35卷。《全蜀艺文志》全书按文体分类编排,分赋、诗、诗余、诏策、赦文、表、疏、状、书笺、书、序、记、檄、难、牒、箴、铭、赞、颂、碑文、论、说、辩、考、述、议、杂著、谱、跋、赤牒、行纪等类。明何炯所编《清源文献》为清源一地历代诗文之合集,包括赋、诗、调、偈颂、制、敕、浩、册文、表、露布、奏疏、状、颂、赞、箴、铭、文、拟、原、戒、论、议、评、说、篇、述、问、对、辨、解、读、疑、题、跋、杂著、书、启、序、记、碑、传、行状、祭文、哀辞、墓志铭、圻志、神道碑、墓表、墓碣等数十种文体。明郑岳辑《莆阳文献》、明罗斗等辑《滦川足征录》、明邱吉辑《吴兴绝唱集》、清胡亦堂辑《临川文献》等,亦为多种文体汇辑。

其四是由所收作者身份视之,有专收文人作品的,此类占据多数,如明莫息等《锡山遗响》,辑南宋至明中叶锡山150多位文人之诗。明朱观辑《海岳灵秀集》只选当地有名文人,不入流品者不收。有专收闺秀作品的,如明冒愈昌辑《秦淮四美人诗》、清佚名编《海宁闺阁诗》、清佚名编《海昌闺秀诗》、清蔡寿祺辑《豫章闺秀诗钞》、清毛国姬编《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有专收方外人士作品的,如明释方策辑《善权寺古今文录》、清李邕嗣辑《甬上高僧诗》《珠林风雅》。若更细看之,又有专收布衣文人作品的,如清何梅辑《绥安二布衣诗抄》;专收流寓文人作品的,如明沐昂辑录明初流寓迁谪于云南文人作品的《沧海遗珠》;专收八旗驻防营作者作品的,如清满洲旗人完颜守典辑《杭防诗存》、清蒙古族三多辑《柳营诗传》等。《杭防诗存》是完颜守典辑集的与杭州驻防有关的满族人所写的诗集。三多于同治十年(1871)生于杭州,属杭州驻防蒙古正白旗籍,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并及闺秀,编成《柳营诗传》。

其五是由选录朝代视之,有专选明朝地域诗歌的,如明韩雍等辑《皇明西江诗选》、明舒日敬辑《皇明豫章诗选》、明李敏辑《皇明徽诗汇编》、明谢浣辑《皇明古虞诗集》、明宋弘之等辑《皇朝四明风雅》、清

王崇简辑《畿辅明诗》等;也有专选清代地域诗歌的,如清袁景辂辑《国朝松陵诗征》、清陶樾辑《国朝畿辅诗传》、李锡麟等辑《国朝山右诗存》、清卢见曾辑《国朝山左诗钞》、清杨准辑《国朝中州诗钞》、清郑杰辑《国朝全闽诗录》、清凌扬藻辑《国朝岭海诗钞》、清孙桐生辑《国朝全蜀诗钞》、清袁文揆辑《国朝滇南诗略》等。但更多的地域总集会采选多个朝代的作品,前文提及的《携李诗系》与《甬上耆旧诗》等皆如此,又如清黄登辑《岭南五朝诗选》等,举不胜举。

地域总集既以诗存人,又以人存诗,不但有作品,而且有人物小传等,留存了大量不见于史志、别集等的珍稀文献。研究地域总集,需采用不同的审视视角。从编选宗旨视角研究地域总集,可知编纂者的编选动机,并进一步从文本发生学的视角系统探讨地域总集的编选与时代风潮之间的关联;从采选内容视角研究地域总集,可集中研究地域文学的文本内容,并较为全面地窥探地方文学传统的整体面貌;从文体视角研究地域总集,可细致辨析地方文学的文体发展态势;从收录作者视角研究地域总集,既可研究某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也可探讨某个地方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现象;从选录朝代视角研究地域总集,既可发现地域总集在某个朝代的编纂风貌,又可追溯其历代演变轨迹。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究之,将会得到不同的论述结果。

三、附补与纠谬:地域总集与地方志的耦合关系

地域总集与地方志关系密切。前人对此略有表述。例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道:“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指的是其所编《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相辅而行,阙一不可。”^⑩此语点出了地方志与地域总集存在紧密关系,但并未深入阐述。

地域总集以地缘特质为主而采选作品的属性,与地方志相似。地域总集和地方志分别隶属于“集部”和“史部”两种不同的目录文献系统,但地方志与地域总集皆以地缘属性为断而搜集文献,都以留存

地方文献史料为宗旨,故而联系颇为紧密。中国地方志约起源于战国初期^⑧,宋代编纂地方志时“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但所录诗文十分有限。现存地方志中较早收录文学类作品的是高似孙所辑《剡录》。此书编成于宋嘉定七年(1214),但只有卷五和卷六选录当地文人的少量诗文。地方志的编纂传统,强化了地域文化认同感。系统而全面地展现地方文学状况的强烈需求,更加促使专录地方文学作品,且在收录文献务求上广博的地域总集蓬勃发展起来。明钱穀编《吴郡文粹续编》,仿宋郑虎臣《吴郡文粹》,自说部、类家、诗编、文稿,至断碣、遗碑,无不甄录,汇成300卷,增加了范文穆《吴郡志·艺文志》内容的十倍之多。足可见地域总集对地方文学作品的容量,远远大于地方志中的艺文部分。

若细究之,则可发现地域总集与地方志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耦合关系。首先,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两者是友好共进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从选用材料来看,一方面地域总集的部分材料直接来源于地方志。例如《黔诗纪略》中所收诗歌直接注明选自地方志。“仅从方志得三律、一绝句”^⑨、“仅《方志》各载数诗,又非杰构”^⑩、“唯见《方志》载《平越卫学》一记、《飞泉》《月山》等五诗而已”^⑪诸语,多次出现。该书明确注明采自方志的诗至少120余首。又如《吴郡文粹》,题为“苏台郑虎臣集”。《四库全书总目》曰:“案《苏州府志》,虎臣字景兆,曾为会稽尉。宋德祐初,自请监押贾似道,杀之于木绵庵者,即其人也。是书于吴郡遗文,综辑颇富。”^⑫“盖是书虽称‘文粹’,实与地志相表里,东南文献,多藉是以有征,与范成大《吴郡志》相辅而行,亦如彛有靳矣。”^⑬事实上,《吴郡文粹》本就是《吴郡志》的一部分,并非“相辅而行”。通过比对,不难发现此书实为抄录《吴郡志》而成。明人许元溥《吴乘窃笔》云:“即《吴郡文粹》虽郑公所粹,要皆取材于范文穆《吴郡志》,绝无增减,亦见古人服善心虚,今人不及也。”^⑭而四库馆臣称其堪与《吴郡志》相辅,恐未取两书对勘,而轻率论之。另一方面,地域总集的内容补充了地方志。例如,北宋书学理论家朱文长编《吴郡图经续记》和《吴门总

集》。朱文长,字伯原,苏州人。嘉祐四年进士,年未弱冠,因足疾未赴仕。元祐中苏轼荐充苏州府学教授,绍圣间召为太常博士,官至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由朱氏《吴郡图经续记》自序可知,其编《吴郡图经续记》,是在两任平江知军的高度重视下完成的。^⑮关于此书的编纂与刊刻过程^⑯,王瑞来与高柯立等人曾撰文详论,不再赘述。而后朱氏又将吴郡古今文章,汇编为《吴门总集》,开启了后世方志体例“文征”的先河,不仅赋予地理书兼有郡志和地域总集的性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地域总集并列于地方志的身份。又如明董斯张所编《吴兴备志》与《吴兴艺文补》。董斯张为《吴兴备志》作序曰:“凡某事出某书,某人出某书,眉列其下,人亦不敢轩轻,事不敢论赞,以须乎志乎至者之采焉而已矣。”^⑰此书采书广博,且皆存原貌,能辨书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曰:“采摭极富,于吴兴一郡遗闻琐事,征引略备。……故所摘录,类皆典雅确核,足资考据。”^⑱《吴兴备志》产生于明代剽窃成风的时代怪癖中,却能做到不仅全载原文,而且遇谬详考,内容充实,尤为值得称颂。但董氏的同里人朱国祯为《吴兴艺文补》所作序中说:“泛者为《广博物志》,精者为《吴兴备志》,而《补艺文》尤详。吾郡故有志,志中之文绝稀。”^⑲此序一针见血地指出《吴兴备志》收录作品十分稀少的问题。方志之体用既以“稽考方域、详究規制”为例,虽设“艺文”之类,用来彰显一地人文之盛,但收录作品常常不能博尽。故董氏于《吴兴备志》后又辑《吴兴艺文补》。其子董说在《刻〈吴兴艺文补〉感言》中称:“谓必取征于文献。乃勤渔猎,爰补艺文,积有岁年,成兹卷帙。”^⑳足见董斯张辑书之艰辛,又可知《吴兴艺文补》不仅补充了《吴兴备志》的内容,且取征文献,颇有考订功绩。

其次,从编选时间顺序来看,有的是修方志之时,趁便辑成地域总集。例如宋代李兼以一人之力撰《宣城志》之余而编《宣城总集》。二书均佚。依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载郡守赵希远于嘉定九年(1216)所作序,可推知《宣城志》成书时间不迟于嘉定九年。《宣城总集序》中云孙梦观任宁国知府时促此书

以成^②，则知《宣城总集》编成于孙梦观守任宁国府期间，即宝庆三年至绍定元年(1227-1228)。故《宣城志》成书应早于《宣城总集》。《宣城志》既已编成，则知与宣城有关的诸多文献史料已为李兼所得，且李兼诗文创作颇佳，《宣城志》选录了不少诗文作品。《宣城总集》选录自晋、宋、齐、梁至宋一千余年之诗文，是宣城地区文学传统和文学创作实绩的结集和印证。而也有的是先编地域总集，以备修志。如明汤宾尹所编《宣城右集》(全名为《宣城县志右纂》)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宣城地域总集。汤氏另编有一部《宣城县志左纂》。此书已佚。这两部书的编纂是为《宣城县志》做准备。只是汤氏还未来得及完成《宣城县志》便离世了，直到清顺治年间才由知县王同春组织编纂完成。而《宣城右集》中诗文多为《宣城县志》所用。

最后，从编纂体例来看，地方志的类目编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地域总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从宋代起，地域总集与地方志的编纂似乎呈现出一种如影随形的关系。而文献收录齐备、体例较为成熟的地方志常常先行于地域总集。从绍兴九年(1138)董弁《严陵集》的自序中可知，该书是编于《严陵图经》之后。《赤城集》成书于《嘉定赤城志》后。明清时期此类例子也是俯拾皆是。地方志以其广搜博取的收文方式和趋于完备的编纂体例，为同一地理空间的地域总集提供了可鉴之本。宋孔延之所编《会稽掇英总集》，辑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至宋熙宁年间有关会稽的题咏诗文共805篇。《会稽掇英总集》的一级类目与《文选》等总集类似，皆以文体相分。但“州宅”、“西园”、“送贺建”、“山水”(其下又设“鉴湖”、“兰亭”、“剡中”、“天姥”、“五泄山”、“石伞峰”、“四明山”等)、“寺观”等，皆是之前总集类目设置中未曾出现过的。这些类目都带有吴郡浓重的地方色彩。这种类目设置倾向也影响了之后的《成都文类》。又如，宋《赤城集》的编者林表民，曾参与陈耆卿主持的《嘉定赤城志》编纂工作，后又续编了《赤城续志》《赤城三志》等。《赤城集》是为《嘉定赤城志》之不足而编。《赤城集》所设诸多类目，与《嘉定赤城志》类似；

且《赤城集》所收诗文的主题编次顺序也与《嘉定赤城志》类目雷同。故知该书编纂体例有意模仿地方志。《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赤城集》等的编纂体例均借鉴了地方志。而宋代地域总集的这些做法也深深影响了明清时期地域总集的体类设置。明钱穀所编《吴郡文粹续集》、清顾沅所编《吴郡文编》等也效法地方志，建构类目清晰而层次分明的编纂体例。

但同时地域总集与地方志又呈现“斗争”的矛盾关系，即地域总集与地方志互相纠正对方的错误。例如《宣城右集》中的诗文为《宁国府志》《宣城县志》所采时，因志书体例与篇幅限制，或窜改，或删削，多已面目全非。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万历年间所修《宁国府志》曰：“时惟少参古林沈君、黄山焦君、州守古坛吴君、郡判一川陆君、令尹玉峰刘君、春元峰阳梅君暨诸人士各有叙述，以称盛迹。”^③然《宣城右集》卷十七云：“时惟少参古林沈君及两山孙君自建宁任以制忧不与在坐，少参黄山焦君、州守古坛吴君、郡判一川陆君、西涧万君、令尹玉峰刘君、而少尹鹤田金君、笔峰沈君、春元峰阳梅君辈继至，各有叙述。”^④经过《宁国府志》的改动，既丢失了诸多关键信息(如删掉“两山孙君”，则不知孙溶曾于嘉靖四十年(1561)泉州府推官摄任福建建宁知县、丁忧回籍的为宦经历)，又出现了错误，即沈宠当时在外为官而被删后却变为身处宣城了。

地方志的发展，促进了地域总集的兴盛。地域总集以其充足的容量弥补了地方志收录诗文量少的缺憾，又与地方志具有相辅相成又交错互补的耦合关系。

四、精微与突进：地域总集的演变轨迹

地域总集的发展历程颇为复杂，兹从纵向时间维度、横向空间维度和内部类型嬗递三条路径追溯其演变主干轨迹。

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与一般总集不同，地域总集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特征。由于诗文作品处于持续生产的状态，故而需要编者不断在原有地域总集的基础上进行续补。例如对安徽诗歌的编录，有《宛

陵群英集》《宛雅初编》《宛雅二编》和《宛雅三编》等。元汪泽民等辑《宛陵群英集》，主要收录寓居宣城人士的作品。明梅鼎祚《宛雅初编》收录唐至明正德年间92位宣城文人所作诗646首，等。梅鼎祚对于入选者“凡爵秩事实，或略纪数语，或缺而待核”^⑤。清施念曾和张汝霖详加补辑，“先考史传，史无，即征诸传记墓志；更无可征，则取郡邑各志登之”^⑥，并于作者小传之后附有历代对入选文人及作品品评，可资参考者颇多。清初施闰章等继《宛雅初编》后又合编了《宛雅二编》，重点收录明正德至晚明73位宣城籍贯文人的诗作凡451首。《宛雅初编》与《宛雅二编》之后，又历百年，宣城诗作暴增，编者感到又有重新辑纂宛诗的 necessity。所以张汝霖称：“窃附前人表微之意，矢志再续，愚山（施闰章）先生曾孙竹窗适有同心，相与广搜考订，始癸（1743），迄己巳（1749），越七岁，乃得成书。以前刻为初编，续者为二编，今续为三编，俾后之君子，继此续之，以至于无穷也。”^⑦施念曾与张汝霖合纂《宛雅三编》，补《宛雅初编》和《宛雅二编》所遗，录诗1401首，作者279人。该书备采輿言，笔记、方志等文献中凡有对宣城人（包括“奄弃未久”之作者）诗作之评论皆录入。又如，辑录浙江温州作者诗作的地域总集，成书于明弘治年间的明赵谏编《东瓯诗集》《东瓯续集》与《东瓯续集补遗》，共收录梁至明318人之诗1256首；而编于清乾隆年间的《东瓯诗存》则选录宋至乾隆时期温州府968人之诗共5377首，所录诗数是前者的4倍多。类似的还有，宋林表民《赤城集》与明谢铎《赤城后集》、清黄宗羲《姚江逸诗》与清倪继宗《续姚江逸诗》、清丁晏《山阳诗征》（26卷）与清王锡祺《山阳诗征续编》（44卷）、清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与清张鹏展《国朝山左补钞》和清余正西《国朝山左诗汇钞后集》等。以上地域总集的系列成书过程，明晰地体现出时间线上的连续性特征。

其次，从空间维度来看，地域总集的分布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分布方面。唐五代时期的地域总集数量较少，只是零星面向东南地区某一州或自然地理区域。唐殷璠编《丹阳集》，聚焦于

润州五县；殷璠编《荆扬挺秀集》，聚焦于唐代荆、扬二州区域；五代刘松编《宜阳集》，聚焦于袁州地区；黄滔《泉山秀句集》（30卷），聚焦于唐代闽地。到了宋代，虽也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但数量有所增加，且渐呈连片趋势。在南宋嘉定年间，李兼就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州为一集，在昔有之。近岁东南郡皆有集。”^⑧至于其他地区，除广西、四川两地尚有数种问世外，并未形成编纂风气。到了明代，地域总集的编纂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铺开，不仅延伸到某些边远地区，而且北方地区也初步形成了编纂风气。而发展至清代，地域总集的地域分布范围更要宽广得多。东南与四川地区的编纂风气更加兴盛，且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域总集的编纂活动也较为活跃^⑨。台湾地区有清杨希闵辑《台湾杂咏合刻》、清唐景崧辑《诗畸》《外编》等。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改变了宋元明以来北方诸省、府、县等少有地域总集出现的局面，在直隶地区涌现出如孙赞元《遵化诗存》、章学诚《永清文征》、梅成栋《津门诗钞》等；在山西地区出现范鄙鼎《三晋诗选》、赵瑾《晋风选》、李锡麟等《国朝山右诗存》等；河南地区有杨淮《国朝中州诗钞》、刘海涵《信阳诗钞》、张邦伸等《汜南诗钞》等；陕西与甘肃地区有李元春《关中两朝诗钞》、李苞《洮阳诗集》等；山东地区涌出李衍孙《国朝武定诗钞》、王钟霖《国朝历下诗钞》、孔宪彝《曲阜诗钞》等。清代北方大批地域总集的出现，使得其与南方呈现分庭抗礼的格局。二是层级分布方面，唐宋时期地域总集集中于府一级，如唐殷璠编《丹阳集》、宋孔延之编《会稽掇英总集》等，也有少数县一级的，如五代刘松编《宜阳集》、宋林逢吉辑《赤城集》等。元明时期，县一级地域总集的数量有所增加，出现不少省一级的地方总集，如明谢肇淛辑《滇文》、明李敏辑《徽郡诗》等。到了清代，才形成了完整而平衡的省、府、县、镇四级体系。嘉兴县梅里镇有李维均辑《梅会诗人遗集》等乡镇总集的出现，显示了地域总集的编纂朝深化、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最后，是地域总集类型的演变轨迹。唐五代时期，文集类地域总集占据主流地位。《丹阳集》选录盛

唐润州诗人佳作,《宜阳集》亦“辑其里中人之所作”。《荆扬挺秀集》与《泉山秀句集》等,也属于文集类。宋代地域总集的编纂,深受史部传记类和地理类典籍的影响,“或依附于地理志的编修而成书,或依赖于地理志编纂所收集的文献资料而选录”^⑨,故史志类占据主流,文集类则如支流延展。在元代史志类又隐为潜流,文集类渐成主流。元代涌现出如房祺辑《河汾诸老诗集》、汪泽民等辑《宛陵群英集》等多部着眼于选录地方文人佳作的文集类地域总集。到了明代,这两大类型才趋于相对平衡。而发展至清代乃至民国时期,文集类又超过史志类,占据了主导地位。先后有汪森辑《粤西诗载》、章学诚辑《永清文征》、魏元旷辑《南昌邑乘诗征》等问世。史志类的数量虽然不及前者,但也称得上源远流长,陆续出现有沈季友辑《携李诗系》、曹炜辑《沙头里志诗文征》、方树梅辑《晋宁诗征》和《晋宁文征》等。

综上所述,地域总集的编纂具有时间轴上明显的链条式延续性,文本内容不断增补,力求完备;在空间分布上,日渐覆盖偏远地区,且呈现多层次蔓延突进趋势;而在类型嬗递上,史志类和文集类两种主要类型长期处于角逐态势。

注释:

-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01-3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 ②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 ③夏勇:《目录学视域下的地域总集范畴辨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10期。
- 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第8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 ⑤⑥⑧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㐀㐁㐂㐃㐄㐅㐆㐇㐈㐉㐊㐋㐌㐍㐎㐏㐐㐑㐒㐓㐔㐕㐖㐗㐘㐙㐚㐛㐜㐝㐞㐟㐠㐡㐢㐣㐤㐥㐦㐧㐨㐩㐪㐫㐬㐭㐮㐯㐰㐱㐲㐳㐴㐵㐶㐷㐸㐹㐺㐻㐼㐽㐾㐿㑀㑁㑂㑃㑄㑅㑆㑇㑈㑉㑊㑋㑌㑍㑎㑏㑐㑑㑒㑓㑔㑕㑖㑗㑘㑙㑚㑛㑜㑝㑞㑟㑠㑡㑢㑣㑤㑥㑦㑧㑨㑩㑪㑫㑬㑭㑮㑯㑰㑱㑲㑳㑴㑵㑶㑷㑸㑹㑺㑻㑼㑽㑾㑿㒀㒁㒂㒃㒄㒅㒆㒇㒈㒉㒊㒋㒌㒍㒎㒏㒐㒑㒒㒓㒔㒕㒖㒗㒘㒙㒚㒛㒜㒝㒞㒟㒠㒡㒢㒣㒤㒥㒦㒧㒨㒩㒪㒫㒬㒭㒮㒯㒰㒱㒲㒳㒴㒵㒶㒷㒸㒹㒺㒻㒼㒽㒾㒿㓀㓁㓂㓃㓄㓅㓆㓇㓈㓉㓊㓋㓌㓍㓎㓏㓐㓑㓒㓓㓔㓕㓖㓗㓘㓙㓚㓛㓜㓝㓞㓟㓠㓡㓢㓣㓤㓥㓦㓧㓨㓩㓪㓫㓬㓭㓮㓯㓰㓱㓲㓳㓴㓵㓶㓷㓸㓹㓺㓻㓼㓽㓾㓿㔀㔁㔂㔃㔄㔅㔆㔇㔈㔉㔊㔋㔌㔍㔎㔏㔐㔑㔒㔓㔔㔕㔖㔗㔘㔙㔚㔛㔜㔝㔞㔟㔠㔡㔢㔣㔤㔥㔦㔧㔨㔩㔪㔫㔬㔭㔮㔯㔰㔱㔲㔳㔴㔵㔶㔷㔸㔹㔺㔻㔼㔽㔾㔿㕀㕁㕂㕃㕄㕅㕆㕇㕈㕉㕊㕋㕌㕍㕎㕏㕐㕑㕒㕓㕔㕕㕖㕗㕘㕙㕚㕛㕜㕝㕞㕟㕠㕡㕢㕣㕤㕥㕦㕧㕨㕩㕪㕫㕬㕭㕮㕯㕰㕱㕲㕳㕴㕵㕶㕷㕸㕹㕺㕻㕼㕽㕾㕿㖀㖁㖂㖃㖄㖅㖆㖇㖈㖉㖊㖋㖌㖍㖎㖏㖐㖑㖒㖓㖔㖕㖖㖗㖘㖙㖚㖛㖜㖝㖞㖟㖠㖡㖢㖣㖤㖥㖦㖧㖨㖩㖪㖫㖬㖭㖮㖯㖰㖱㖲㖳㖴㖵㖶㖷㖸㖹㖺㖻㖼㖽㖾㖿㗀㗁㗂㗃㗄㗅㗆㗇㗈㗉㗊㗋㗌㗍㗎㗏㗐㗑㗒㗓㗔㗕㗖㗗㗘㗙㗚㗛㗜㗝㗞㗟㗠㗡㗢㗣㗤㗥㗦㗧㗨㗩㗪㗫㗬㗭㗮㗯㗰㗱㗲㗳㗴㗵㗶㗷㗸㗹㗺㗻㗼㗽㗾㗿㘀㘁㘂㘃㘄㘅㘆㘇㘈㘉㘊㘋㘌㘍㘎㘏㘐㘑㘒㘓㘔㘕㘖㘗㘘㘙㘚㘛㘜㘝㘞㘟㘠㘡㘢㘣㘤㘥㘦㘧㘨㘩㘪㘫㘬㘭㘮㘯㘰㘱㘲㘳㘴㘵㘶㘷㘸㘹㘺㘻㘼㘽㘾㘿㙀㙁㙂㙃㙄㙅㙆㙇㙈㙉㙊㙋㙌㙍㙎㙏㙐㙑㙒㙓㙔㙕㙖㙗㙘㙙㙚㙛㙜㙝㙞㙟㙠㙡㙢㙣㙤㙥㙦㙧㙨㙩㙪㙫㙬㙭㙮㙯㙰㙱㙲㙳㙴㙵㙶㙷㙸㙹㙺㙻㙼㙽㙾㙿㚀㚁㚂㚃㚄㚅㚆㚇㚈㚉㚊㚋㚌㚍㚎㚏㚐㚑㚒㚓㚔㚕㚖㚗㚘㚙㚚㚛㚜㚝㚞㚟㚠㚡㚢㚣㚤㚥㚦㚧㚨㚩㚪㚫㚬㚭㚮㚯㚰㚱㚲㚳㚴㚵㚶㚷㚸㚹㚺㚻㚼㚽㚾㚿㜀㜁㜂㜃㜄㜅㜆㜇㜈㜉㜊㜋㜌㜍㜎㜏㜐㜑㜒㜓㜔㜕㜖㜗㜘㜙㜚㜛㜜㜝㜞㜟㜠㜡㜢㜣㜤㜥㜦㜧㜨㜩㜪㜫㜬㜭㜮㜯㜰㜱㜲㜳㜴㜵㜶㜷㜸㜹㜺㜻㜼㜽㜾㜿㝀㝁㝂㝃㝄㝅㝆㝇㝈㝉㝊㝋㝌㝍㝎㝏㝐㝑㝒㝓㝔㝕㝖㝗㝘㝙㝚㝛㝜㝝㝞㝟㝠㝡㝢㝣㝤㝥㝦㝧㝨㝩㝪㝫㝬㝭㝮㝯㝰㝱㝲㝳㝴㝵㝶㝷㝸㝹㝺㝻㝼㝽㝾㝿㞀㞁㞂㞃㞄㞅㞆㞇㞈㞉㞊㞋㞌㞍㞎㞏㞐㞑㞒㞓㞔㞕㞖㞗㞘㞙㞚㞛㞜㞝㞞㞟㞠㞡㞢㞣㞤㞥㞦㞧㞨㞩㞪㞫㞬㞭㞮㞯㞰㞱㞲㞳㞴㞵㞶㞷㞸㞹㞺㞻㞼㞽㞾㞿㟀㟁㟂㟃㟄㟅㟆㟇㟈㟉㟊㟋㟌㟍㟎㟏㟐㟑㟒㟓㟔㟕㟖㟗㟘㟙㟚㟛㟜㟝㟞㟟㟠㟡㟢㟣㟤㟥㟦㟧㟨㟩㟪㟫㟬㟭㟮㟯㟰㟱㟲㟳㟴㟵㟶㟷㟸㟹㟺㟻㟼㟽㟾㟿㠀㠁㠂㠃㠄㠅㠆㠇㠈㠉㠊㠋㠌㠍㠎㠏㠐㠑㠒㠓㠔㠕㠖㠗㠘㠙㠚㠛㠜㠝㠞㠟㠠㠡㠢㠣㠤㠥㠦㠧㠨㠩㠪㠫㠬㠭㠮㠯㠰㠱㠲㠳㠴㠵㠶㠷㠸㠹㠺㠻㠼㠽㠾㠿㡀㡁㡂㡃㡄㡅㡆㡇㡈㡉㡊㡋㡌㡍㡎㡏㡐㡑㡒㡓㡔㡕㡖㡗㡘㡙㡚㡛㡜㡝㡞㡟㡠㡡㡢㡣㡤㡥㡦㡧㡨㡩㡪㡫㡬㡭㡮㡯㡰㡱㡲㡳㡴㡵㡶㡷㡸㡹㡺㡻㡼㡽㡾㡿㢀㢁㢂㢃㢄㢅㢆㢇㢈㢉㢊㢋㢌㢍㢎㢏㢐㢑㢒㢓㢔㢕㢖㢗㢘㢙㢚㢛㢜㢝㢞㢟㢠㢡㢢㢣㢤㢥㢦㢧㢨㢩㢪㢫㢬㢭㢮㢯㢰㢱㢲㢳㢴㢵㢶㢷㢸㢹㢺㢻㢼㢽㢾㢿㣀㣁㣂㣃㣄㣅㣆㣇㣈㣉㣊㣋㣌㣍㣎㣏㣐㣑㣒㣓㣔㣕㣖㣗㣘㣙㣚㣛㣜㣝㣞㣟㣠㣡㣢㣣㣤㣥㣦㣧㣨㣩㣪㣫㣬㣭㣮㣯㣰㣱㣲㣳㣴㣵㣶㣷㣸㣹㣺㣻㣼㣽㣾㣿㤀㤁㤂㤃㤄㤅㤆㤇㤈㤉㤊㤋㤌㤍㤎㤏㤐㤑㤒㤓㤔㤕㤖㤗㤘㤙㤚㤛㤜㤝㤞㤟㤠㤡㤢㤣㤤㤥㤦㤧㤨㤩㤪㤫㤬㤭㤮㤯㤰㤱㤲㤳㤴㤵㤶㤷㤸㤹㤺㤻㤼㤽㤾㤿㥀㥁㥂㥃㥄㥅㥆㥇㥈㥉㥊㥋㥌㥍㥎㥏㥐㥑㥒㥓㥔㥕㥖㥗㥘㥙㥚㥛㥜㥝㥞㥟㥠㥡㥢㥣㥤㥥㥦㥧㥨㥩㥪㥫㥬㥭㥮㥯㥰㥱㥲㥳㥴㥵㥶㥷㥸㥹㥺㥻㥼㥽㥾㥿㦀㦁㦂㦃㦄㦅㦆㦇㦈㦉㦊㦋㦌㦍㦎㦏㦐㦑㦒㦓㦔㦕㦖㦗㦘㦙㦚㦛㦜㦝㦞㦟㦠㦡㦢㦣㦤㦥㦦㦧㦨㦩㦪㦫㦬㦭㦮㦯㦰㦱㦲㦳㦴㦵㦶㦷㦸㦹㦺㦻㦼㦽㦾㦿㧀㧁㧂㧃㧄㧅㧆㧇㧈㧉㧊㧋㧌㧍㧎㧏㧐㧑㧒㧓㧔㧕㧖㧗㧘㧙㧚㧛㧜㧝㧞㧟㧠㧡㧢㧣㧤㧥㧦㧧㧨㧩㧪㧫㧬㧭㧮㧯㧰㧱㧲㧳㧴㧵㧶㧷㧸㧹㧺㧻㧼㧽㧾㧿㨀㨁㨂㨃㨄㨅㨆㨇㨈㨉㨊㨋㨌㨍㨎㨏㨐㨑㨒㨓㨔㨕㨖㨗㨘㨙㨚㨛㨜㨝㨞㨟㨠㨡㨢㨣㨤㨥㨦㨧㨨㨩㨪㨫㨬㨭㨮㨯㨰㨱㨲㨳㨴㨵㨶㨷㨸㨹㨺㨻㨼㨽㨾㨿㩀㩁㩂㩃㩄㩅㩆㩇㩈㩉㩊㩋㩌㩍㩎㩏㩐㩑㩒㩓㩔㩕㩖㩗㩘㩙㩚㩛㩜㩝㩞㩟㩠㩡㩢㩣㩤㩥㩦㩧㩨㩩㩪㩫㩬㩭㩮㩯㩰㩱㩲㩳㩴㩵㩶㩷㩸㩹㩺㩻㩼㩽㩾㩿㪀㪁㪂㪃㪄㪅㪆㪇㪈㪉㪊㪋㪌㪍㪎㪏㪐㪑㪒㪓㪔㪕㪖㪗㪘㪙㪚㪛㪜㪝㪞㪟㪠㪡㪢㪣㪤㪥㪦㪧㪨㪩㪪㪫㪬㪭㪮㪯㪰㪱㪲㪳㪴㪵㪶㪷㪸㪹㪺㪻㪼㪽㪾㪿㫀㫁㫂㫃㫄㫅㫆㫇㫈㫉㫊㫋㫌㫍㫎㫏㫐㫑㫒㫓㫔㫕㫖㫗㫘㫙㫚㫛㫜㫝㫞㫟㫠㫡㫢㫣㫤㫥㫦㫧㫨㫩㫪㫫㫬㫭㫮㫯㫰㫱㫲㫳㫴㫵㫶㫷㫸㫹㫺㫻㫼㫽㫾㫿㬀㬁㬂㬃㬄㬅㬆㬇㬈㬉㬊㬋㬌㬍㬎㬏㬐㬑㬒㬓㬔㬕㬖㬗㬘㬙㬚㬛㬜㬝㬞㬟㬠㬡㬢㬣㬤㬥㬦㬧㬨㬩㬪㬫㬬㬭㬮㬯㬰㬱㬲㬳㬴㬵㬶㬷㬸㬹㬺㬻㬼㬽㬾㬿㭀㭁㭂㭃㭄㭅㭆㭇㭈㭉㭊㭋㭌㭍㭎㭏㭐㭑㭒㭓㭔㭕㭖㭗㭘㭙㭚㭛㭜㭝㭞㭟㭠㭡㭢㭣㭤㭥㭦㭧㭨㭩㭪㭫㭬㭭㭮㭯㭰㭱㭲㭳㭴㭵㭶㭷㭸㭹㭺㭻㭼㭽㭾㭿㮀㮁㮂㮃㮄㮅㮆㮇㮈㮉㮊㮋㮌㮍㮎㮏㮐㮑㮒㮓㮔㮕㮖㮗㮘㮙㮚㮛㮜㮝㮞㮟㮠㮡㮢㮣㮤㮥㮦㮧㮨㮩㮪㮫㮬㮭㮮㮯㮰㮱㮲㮳㮴㮵㮶㮷㮸㮹㮺㮻㮼㮽㮾㮿㯀㯁㯂㯃㯄㯅㯆㯇㯈㯉㯊㯋㯌㯍㯎㯏㯐㯑㯒㯓㯔㯕㯖㯗㯘㯙㯚㯛㯜㯝㯞㯟㯠㯡㯢㯣㯤㯥㯦㯧㯨㯩㯪㯫㯬㯭㯮㯯㯰㯱㯲㯳㯴㯵㯶㯷㯸㯹㯺㯻㯼㯽㯾㯿㰀㰁㰂㰃㰄㰅㰆㰇㰈㰉㰊㰋㰌㰍㰎㰏㰐㰑㰒㰓㰔㰕㰖㰗㰘㰙㰚㰛㰜㰝㰞㰟㰠㰡㰢㰣㰤㰥㰦㰧㰨㰩㰪㰫㰬㰭㰮㰯㰰㰱㰲㰳㰴㰵㰶㰷㰸㰹㰺㰻㰼㰽㰾㰿㱀㱁㱂㱃㱄㱅㱆㱇㱈㱉㱊㱋㱌㱍㱎㱏㱐㱑㱒㱓㱔㱕㱖㱗㱘㱙㱚㱛㱜㱝㱞㱟㱠㱡㱢㱣㱤㱥㱦㱧㱨㱩㱪㱫㱬㱭㱮㱯㱰㱱㱲㱳㱴㱵㱶㱷㱸㱹㱺㱻㱼㱽㱾㱿㲀㲁㲂㲃㲄㲅㲆㲇㲈㲉㲊㲋㲌㲍㲎㲏㲐㲑㲒㲓㲔㲕㲖㲗㲘㲙㲚㲛㲜㲝㲞㲟㲠㲡㲢㲣㲤㲥㲦㲧㲨㲩㲪㲫㲬㲭㲮㲯㲰㲱㲲㲳㲴㲵㲶㲷㲸㲹㲺㲻㲼㲽㲾㲿㳀㳁㳂㳃㳄㳅㳆㳇㳈㳉㳊㳋㳌㳍㳎㳏㳐㳑㳒㳓㳔㳕㳖㳗㳘㳙㳚㳛㳜㳝㳞㳟㳠㳡㳢㳣㳤㳥㳦㳧㳨㳩㳪㳫㳬㳭㳮㳯㳰㳱㳲㳳㳴㳵㳶㳷㳸㳹㳺㳻㳼㳽㳾㳿㴀㴁㴂㴃㴄㴅㴆㴇㴈㴉㴊㴋㴌㴍㴎㴏㴐㴑㴒㴓㴔㴕㴖㴗㴘㴙㴚㴛㴜㴝㴞㴟㴠㴡㴢㴣㴤㴥㴦㴧㴨㴩㴪㴫㴬㴭㴮㴯㴰㴱㴲㴳㴴㴵㴶㴷㴸㴹㴺㴻㴼㴽㴾㴿㵀㵁㵂㵃㵄㵅㵆㵇㵈㵉㵊㵋㵌㵍㵎㵏㵐㵑㵒㵓㵔㵕㵖㵗㵘㵙㵚㵛㵜㵝㵞㵟㵠㵡㵢㵣㵤㵥㵦㵧㵨㵩㵪㵫㵬㵭㵮㵯㵰㵱㵲㵳㵴㵵㵶㵷㵸㵹㵺㵻㵼㵽㵾㵿㶀㶁㶂㶃㶄㶅㶆㶇㶈㶉㶊㶋㶌㶍㶎㶏㶐㶑㶒㶓㶔㶕㶖㶗㶘㶙㶚㶛㶜㶝㶞㶟㶠㶡㶢㶣㶤㶥㶦㶧㶨㶩㶪㶫㶬㶭㶮㶯㶰㶱㶲㶳㶴㶵㶶㶷㶸㶹㶺㶻㶼㶽㶾㶿㷀㷁㷂㷃㷄㷅㷆㷇㷈㷉㷊㷋㷌㷍㷎㷏㷐㷑㷒㷓㷔㷕㷖㷗㷘㷙㷚㷛㷜㷝㷞㷟㷠㷡㷢㷣㷤㷥㷦㷧㷨㷩㷪㷫㷬㷭㷮㷯㷰㷱㷲㷳㷴㷵㷶㷷㷸㷹㷺㷻㷼㷽㷾㷿㸀㸁㸂㸃㸄㸅㸆㸇㸈㸉㸊㸋㸌㸍㸎㸏㸐㸑㸒㸓㸔㸕㸖㸗㸘㸙㸚㸛㸜㸝㸞㸟㸠㸡㸢㸣㸤㸥㸦㸧㸨㸩㸪㸫㸬㸭㸮㸯㸰㸱㸲㸳㸴㸵㸶㸷㸸㸹㸺㸻㸼㸽㸾㸿㹀㹁㹂㹃㹄㹅㹆㹇㹈㹉㹊㹋㹌㹍㹎㹏㹐㹑㹒㹓㹔㹕㹖㹗㹘㹙㹚㹛㹜㹝㹞㹟㹠㹡㹢㹣㹤㹥㹦㹧㹨㹩㹪㹫㹬㹭㹮㹯㹰㹱㹲㹳㹴㹵㹶㹷㹸㹹㹺㹻㹼㹽㹾㹿㺀㺁㺂㺃㺄㺅㺆㺇㺈㺉㺊㺋㺌㺍㺎㺏㺐㺑㺒㺓㺔㺕㺖㺗㺘㺙㺚㺛㺜㺝㺞㺟㺠㺡㺢㺣㺤㺥㺦㺧㺨㺩㺪㺫㺬㺭㺮㺯㺰㺱㺲㺳㺴㺵㺶㺷㺸㺹㺺㺻㺼㺽㺾㺿㻀㻁㻂㻃㻄㻅㻆㻇㻈㻉㻊㻋㻌㻍㻎㻏㻐㻑㻒㻓㻔㻕㻖㻗㻘㻙㻚㻛㻜㻝㻞㻟㻠㻡㻢㻣㻤㻥㻦㻧㻨㻩㻪㻫㻬㻭㻮㻯㻰㻱㻲㻳㻴㻵㻶㻷㻸㻹㻺㻻㻼㻽㻾㻿㼀㼁㼂㼃㼄㼅㼆㼇㼈㼉㼊㼋㼌㼍㼎㼏㼐㼑㼒㼓㼔㼕㼖㼗㼘㼙㼚㼛㼜㼝㼞㼟㼠㼡㼢㼣㼤㼥㼦㼧㼨㼩㼪㼫㼬㼭㼮㼯㼰㼱㼲㼳㼴㼵㼶㼷㼸㼹㼺㼻㼼㼽㼾㼿㽀㽁㽂㽃㽄㽅㽆㽇㽈㽉㽊㽋㽌㽍㽎㽏㽐㽑㽒㽓㽔㽕㽖㽗㽘㽙㽚㽛㽜㽝㽞㽟㽠㽡㽢㽣㽤㽥㽦㽧㽨㽩㽪㽫㽬㽭㽮㽯㽰㽱㽲㽳㽴㽵㽶㽷㽸㽹㽺㽻㽼㽽㽾㽿㿀㿁㿂㿃㿄㿅㿆㿇㿈㿉㿊㿋㿌㿍㿎㿏㿐㿑㿒㿓㿔㿕㿖㿗㿘㿙㿚㿛㿜㿝㿞㿟㿠㿡㿢㿣㿤㿥㿦㿧㿨㿩㿪㿫㿬㿭㿮㿯㿰㿱㿲㿳㿴㿵㿶㿷㿸㿹㿺㿻㿼㿽㿾㿿

- ⑨袁说友:《东塘集》,第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⑩董弅:《严陵集》,第2页,中国书店2018年版。
- ⑪张应遴:《海虞文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2册,第229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 ⑫范弘嗣:《晋国垂棘》,《历代地方诗文集汇编》第22册,第10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
- ⑬黄宗羲:《姚江逸诗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吴光执行主编,平惠善校点,第1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 ⑭胡文学等:《甬上耆旧诗》,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第1页,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
- ⑮王应奎、瞿绍基:《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罗时进、王文荣点校,第6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 ⑯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第828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 ⑰吕志毅:《方志起源研究》,《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5期。
-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㐀㐁㐂㐃㐄㐅㐆㐇㐈㐉㐊㐋㐌㐍㐎㐏㐐㐑㐒㐓㐔㐕㐖㐗㐘㐙㐚㐛㐜㐝㐞㐟㐠㐡㐢㐣㐤㐥㐦㐧㐨㐩㐪㐫㐬㐭㐮㐯㐰㐱㐲㐳㐴㐵㐶㐷㐸㐹㐺㐻㐼㐽㐾㐿㑀㑁㑂㑃㑄㑅㑆㑇㑈㑉㑊㑋㑌㑍㑎㑏㑐㑑㑒㑓㑔㑕㑖㑗㑘㑙㑚㑛㑜㑝㑞㑟㑠㑡㑢㑣㑤㑥㑦㑧㑨㑩㑪㑫㑬㑭㑮㑯㑰㑱㑲㑳㑴㑵㑶㑷㑸㑹㑺㑻㑼㑽㑾㑿㒀㒁㒂㒃㒄㒅㒆㒇㒈㒉㒊㒋㒌㒍㒎㒏㒐㒑㒒㒓㒔㒕㒖㒗㒘㒙㒚㒛㒜㒝㒞㒟㒠㒡㒢㒣㒤㒥㒦㒧㒨㒩㒪㒫㒬㒭㒮㒯㒰㒱㒲㒳㒴㒵㒶㒷㒸㒹㒺㒻㒼㒽㒾㒿㓀㓁㓂㓃㓄㓅㓆㓇㓈㓉㓊㓋㓌㓍㓎㓏㓐㓑㓒㓓㓔㓕㓖㓗㓘㓙㓚㓛㓜㓝㓞㓟㓠㓡㓢㓣㓤㓥㓦㓧㓨㓩㓪㓫㓬㓭㓮㓯㓰㓱㓲㓳㓴㓵㓶㓷㓸㓹㓺㓻㓼㓽㓾㓿㔀㔁㔂㔃㔄㔅㔆㔇㔈㔉㔊㔋㔌㔍㔎㔏㔐㔑㔒㔓㔔㔕㔖㔗㔘㔙㔚㔛㔜㔝㔞㔟㔠㔡㔢㔣㔤㔥㔦㔧㔨㔩㔪㔫㔬㔭㔮㔯㔰㔱㔲㔳㔴㔵㔶㔷㔸㔹㔺㔻㔼㔽㔾㔿㕀㕁㕂㕃㕄㕅㕆㕇㕈㕉㕊㕋㕌㕍㕎㕏㕐㕑㕒㕓㕔㕕㕖㕗㕘㕙㕚㕛㕜㕝㕞㕟㕠㕡㕢㕣㕤㕥㕦㕧㕨㕩㕪㕫㕬㕭㕮㕯㕰㕱㕲㕳㕴㕵㕶㕷㕸㕹㕺㕻㕼㕽㕾㕿㖀㖁㖂㖃㖄㖅㖆㖇㖈㖉㖊㖋㖌㖍㖎㖏㖐㖑㖒㖓㖔㖕㖖㖗㖘㖙㖚㖛㖜㖝㖞㖟㖠㖡㖢㖣㖤㖥㖦㖧㖨㖩㖪㖫㖬㖭㖮㖯㖰㖱㖲㖳㖴㖵㖶㖷㖸㖹㖺㖻㖼㖽㖾㖿㗀㗁㗂㗃㗄㗅㗆㗇㗈㗉㗊㗋㗌㗍㗎㗏㗐㗑㗒㗓㗔㗕㗖㗗㗘㗙㗚㗛㗜㗝㗞㗟㗠㗡㗢㗣㗤㗥㗦㗧㗨㗩㗪㗫㗬㗭㗮㗯㗰㗱㗲㗳㗴㗵㗶㗷㗸㗹㗺㗻㗼㗽㗾㗿㘀㘁㘂㘃㘄㘅㘆㘇㘈㘉㘊㘋㘌㘍㘎㘏㘐㘑㘒㘓㘔㘕㘖㘗㘘㘙㘚㘛㘜㘝㘞㘟㘠㘡㘢㘣㘤㘥㘦㘧㘨㘩㘪㘫㘬㘭㘮㘯㘰㘱㘲㘳㘴㘵㘶㘷㘸㘹㘺